

我們若不加反思地順「勢」而思而行，只能帶來思維的鈍化和退化。當我們認定沒有一個神聖的「理」來作為判準，無論做甚麼，我們都能找到一個「理」來為自己開脫。「順勢而思」與「順勢而為」的實質是對理性思考的勾銷，這或許正是造成我們民族健忘症的根本原因。

### 三 順「勢」而思與健忘癥結

余蓮對「勢」的揭示，為我們反思中國人的思維和行為方式提供了深刻的啟示。「勢」論的實質是：沒有一個固定的判準，只有對當時情境的度量，所謂審「時」度「勢」。通俗點講就是：當白戰勝黑的時候，我們認為這是「勢」之必然，是合理的；當黑戰勝白時，我們認為這也是「勢」之必然，同樣是合理的；而當白再次戰勝黑，我們照樣能泰然自若，仍然認定是「勢」之必然，是合理的。

在「勢」本身的正當性都存在疑問的情況下，我們若不加反思地順着此根基不穩的「勢」而思而行，那

只能帶來思維的鈍化和退化。當我們認定一切都以時機、條件為轉移且將其視為自然和必然的時候，我們就沒有必要去反思自己，因為沒有一個神聖的「理」來作為判準；也正因為如此，無論做甚麼，我們隨時都能找到一個「理」來為自己開脫。「順勢而思」與「順勢而為」的實質是對理性思考的勾銷，這或許正是造成我們民族健忘症的根本原因。

惟願我們每個人都能有意識地多作一些理性思考，少一些「順勢而思」和「順勢而為」，從而少一些健忘，我們每個人和我們的民族也因此能少一些苦難。這也許正是余蓮這本著作對我們每一個中國人的有益啟示及對中國文化研究的貢獻。

## 評說晚年周恩來

● 劉 岩



司馬清揚、歐陽龍門：《新發現的周恩來》，上、下冊（紐約：明鏡出版社，2009）。

周恩來是中共歷史上一個相當複雜的人物，由於國史中連篇累牘的政治宣傳與意識形態言說，他在國人的心目中就成為了一位任勞任怨、鞠躬盡瘁的「人民的好總理」。周還是中共樹立的「道德楷模」，他幾乎集智慧、堅忍、英勇等中國優秀傳統品德於一身，在中國民眾中

口碑極好。然而，隨着史料的不斷湧現與學者研究視野的拓寬，對於周的解讀出現了明顯不同於官方的聲音。

近些年關於周恩來的評述中，反響最大的莫過於高文謙所著的《晚年周恩來》（紐約：明鏡出版社，2003）一書。高揭露了許多周不為人知的歷史，對於周的評價也與主流學界大相逕庭。但是其不足之處在於作出過多的關於周的心理活動的探討，許多地方因註釋不夠嚴謹而顯得主觀臆斷過於強烈，客觀真實性略顯不足。司馬清揚與歐陽龍門合力編著而成的《新發現的周恩來》（以下簡稱《新發現》，引用只註頁碼），並沒有使用最新發現的史料，只是對既有的史料重新梳理與解讀。作者顛覆了對周的許多正面評價，向人們塑造出一個完全迥異於「光輝形象」的另類周恩來，也彌補了高著中的某些不足。

綜合評述周恩來是相當困難的，尤其是晚年時期周的行為存在着官方一直強調的「違心」一說。鄧小平說過：「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處的地位十分困難，也說了很多違心的話，做了許多違心的事。」（鄧小平：〈答義大利記者奧琳埃娜·法拉奇問〉，載《鄧小平文選》，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頁348。）同毛澤東發動文革是「好心辦壞事」一樣，周所犯的錯誤就可以堂而皇之地用「違心」來解釋了。但對於「違心」一說，不少學者一直持懷疑和否定態度。丁凱文在《新發現》一書的序言〈千秋功罪任評說——解析「文革」中的周恩來〉中引用了胡平的觀點：「周的言行哪些是違心，哪些是本意呢？我們總

不能說，周的言行，凡是好的都是真心是本意，凡是壞的都是違心是無奈。」（〈序言〉，頁16）因為「違心」與「有意」之間的界定確實是十分模糊的，根本不存在一個明確的區別標準。丁認為周在文革中的所作所為完全是真心實意的，「『違心說』不僅不能減輕周恩來在『文革』中的責任，反而使周恩來墮落成一個沒有人格的軟骨頭和偽君子」（〈序言〉，頁31）。

在中共建國前，周恩來總是能夠審時度勢地站在強者的一邊，長期周旋於王明與毛澤東之間。直到1942年延安整風後，受到批判的周與其他黨內領導人一同向毛檢討，心悅誠服地表示願意接受毛的領導。丁凱文寫到：「自延安整風之後，周恩來在黨內就一直是個輔佐最高領導人的角色，終其一生沒有變化。」（〈序言〉，頁17）自此以後，「檢討」成為中共黨內領導向毛表忠心的工具，而周則是其中檢討做得最積極、最好的一個人。

中共建國後，黨內正常風氣的大面積滑坡始於1958年毛澤東的「反『反冒進』」。1956年周恩來與劉少奇、陳雲等領導人達成了「反冒進」共識，這嚴重挫傷了主張「躍進」的毛的積極性。周還與毛發生了爭執，成為周一生中次數不多、也是最後一次與毛的正面衝突，毛對此事一直耿耿於懷。1958年毛連續召開杭州、南寧、成都等會議「反『反冒進』」，迫使周恩來、陳雲等人檢討，最終周以自我作賤式的檢討得以勉強過關。此次檢討也開創了周自己正確還要檢討的先河，「對毛本人的忠誠大於對其政策的忠誠是周恩來得以屹立不倒的重要原因之

《新發現的周恩來》並沒有使用最新發現的史料，只是對既有的史料重新梳理與解讀。作者顛覆了對周恩來的許多正面評價，向人們塑造出一個完全迥異於「光輝形象」的另類周恩來。

作者認為，周恩來對於毛澤東發動文革並非完全不知情，肯定不是被動地捲入這場運動之中。周積極地參與文革，成為毛發動文革最得力的助手之一。文革中「謀事在毛，成事在周」。

一，這也是周恩來在1958年做檢討之後最大的心得」（〈導言〉，頁37）。此後周彎下的腰桿在毛面前就再也沒有直起來，他的一切思想行動都以毛的意志為轉移，完全喪失了自己的原則立場，「此時的周恩來徹底完成了自延安以來的自我異化」（〈導言〉，頁35-36）。

在1959年的廬山會議上，毛澤東與周恩來之間的「君臣關係」最終確立。周不僅助毛硬將彭德懷等人打成反黨集團，還勸說意見正確的彭向毛檢討。《新發現》揭露了周在全國出現餓死人時，並未認真地對待，反而繼續徵糧而不是開倉放糧，使得大饑荒雪上加霜，「幾千萬人是守着幾百億斤糧食庫存餓死的」（頁107）。在中共黨內長期的「造神運動」中，周的作用也一直被人忽視。周是為毛樹立個人崇拜的始作俑者，早在1940年代就吹捧毛，而且後來在宣傳方式上的水準之高、力度之深也遠在劉少奇、林彪等人之上。大饑荒後為及時修補毛破裂的「神像」，周費盡心思地籌劃與導演起了大型歌舞劇《東方紅》（頁812），文革前他還經常親自揮臂指揮群眾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頁814）。在「神化」毛的過程中，周的責任是最大的，「作為中共元老和建國後的總理，周恩來所臣服而表現出來的巨大感召力是劉少奇所不能比擬的」（頁1106）。

文革前，周恩來是最明白毛澤東心意的人，他積極幫助毛打倒「彭羅陸楊」，在這個過程中的出色表現讓毛看到了他的意願與能力。作者認為，周對於毛在1966年發動文革並非完全不知情，他「對『文化大革命』有可能缺乏某些思想準備，

但周肯定不是被動地捲入這場運動之中的」。周也積極地參與文革，批判朱德、支持中央文革小組、為毛的大字報張目等，成為「毛澤東發動文革最得力的助手之一，也是不可或缺的文革依賴支柱之一」（頁230）。文革中「謀事在毛，成事在周」，周超強的組織與工作能力為毛所欣賞，其所發揮的作用更是無人可代替。

1967年陶鑄倒台後，周恩來真正成為中共的「總管家」，也是文革中最忙最累之人。「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周主持着黨政軍的日常工作，其實權地位也遠在「林副統帥」之上。《新發現》一書指出，雖然文革初期周恩來與林彪都是毛發動文革的主要力量，但是「林彪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是作為一種軍隊力量的『橡皮圖章』，而周恩來是毛澤東文革路線的具體組織者和實施者」（頁479）。作者認為文革中根本就不存在周恩來、江青兩個陣營的對壘，「周、江在一系列重大問題上相當一致，都是在毛的旨意下行事，所不同點在於採取何種形式予以完成」（頁769）。

突如其來的「九一三事件」是毛澤東政治生涯的重大轉捩點，他不但沒有從中享受到以往打倒對手的快感，反而是受到了異常沉重的打擊。在他准許調整國內政策以穩定日漸失序的國內環境時，周恩來得以重拾更多的政治權力，謹慎地平反部分冤假錯案、調整經濟政策等。文革時期周「保人」的真相究竟是怎樣的呢？丁凱文認為周確實在力所能及的條件下保護過一些老幹部，「但是，保護和關照的前提卻是要看毛澤東、江青的臉色行事，

絕非周恩來自己能擅自做主」(〈序言〉,頁27)。作者也強調了在解放與保護老幹部的過程中,「毛澤東是決定者,周恩來是執行者」(頁905),真正起決定作用的始終是毛。實際上,對於那些毛堅決要打倒的幹部,周不但不會施以援手,反而還會做出落井下石之舉。文革後期重新起用鄧小平也是毛一手包辦的,周只是被動的執行者,「毛澤東無疑是鄧小平得到提拔的最重要和決定性的因素」(頁739)。

1969年「珍寶島事件」之後,毛澤東將蘇聯視為中國的最主要敵人,準備聯美抗蘇,適當地調整中國的對外政策。在周恩來等人的努力下,中國得以緩和與美國的關係、與日本建交,尤其是恢復了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由於周主理磋商談判等相關事宜,國內外之人不太了解這一切都是毛在背後拍板的,因而讓周收穫了比毛多得多的鮮花與掌聲。但從此周就掉進了「權高震主」的陷阱,「毛澤東對周恩來從來就不信任,外交上打開局面以後,周恩來在國際上的名聲越來越大」,毛由此而產生出嫉妒(頁618)。之後的1973年「幫周會議」整得周恩來精疲力竭、膽戰心驚,以至於周上手術台前還惴惴不安。

周恩來在文革中是僅次於毛澤東的實權人物,實際上也成為毛在文革中的最大「幫兇」。《新發現》揭露了中央專案組是迫害黨政機關幹部的法西斯組織,而周身為專案組的總負責人,對於一些大案、要案是應該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的。作者證實了周協助毛打倒劉少奇後又置他於死地,而且周對於文革時期

彭德懷的受迫害與賀龍之死也是難辭其咎的。毫不誇張地說,重要黨政人員的倒台都幾乎與周脫不了關係。令人瞠目結舌的是,周還以無產階級專政手段殘酷地清查反對自己的「五一六運動」,全國因此案而受牽連的人不下百萬之巨,從而釀成了文革期間最大的冤案(頁1604)。

在高度個人集權與特定的政治環境下,周恩來之所以能夠化險為夷、全身而退,並不是源於其在黨內的顯赫地位或在民間的崇高威望,而是在於他堅決擁護文革的態度。周小心翼翼地處理與毛的關係,「對於不能向毛挑戰這件事,彭〔德懷〕將軍既認識不到,也做不到,故而不得善終……林彪認識到了,開始也做到了,最終卻做不到……但有一個人既認識到了,又自始至終地做到了……便是曾名滿九州的周恩來總理」(單少傑:《毛澤東執政春秋(1949-1976)》〔紐約:明鏡出版社,2000〕,頁220)。許多中共高層人士受到整肅,晚年難以善終,「就是因為他們沒有能夠像周恩來那樣完成從過去的同志關係、戰友關係、領導和被領導的關係向『君臣關係』的轉變」(〈導言〉,頁36)。低三下四的檢討是周晚年逢凶化吉的「護身符」,逢難必檢討也成為其人生的一大特色。

文革後倖存下來的中共元老津津樂道於「沒有周恩來,文革的災難會更大」之類的偽命題,認為周在最大程度上減輕了文革動亂所造成的破壞,如陳雲說:「沒有周恩來同志,『文化大革命』的後果不堪設想。」(陳雲:〈在中央紀律檢查

作者證實了周恩來協助毛澤東打倒劉少奇後又置他於死地,而且周對於文革時期彭德懷的受迫害與賀龍之死也是難辭其咎的。毫不誇張地說,重要黨政人員的倒台都幾乎與周脫不了關係。

無論周恩來再如何「違心」，再怎麼「顧全大局」，也不能成為他參與迫害別人的理由。我們起碼應當釐清周的那些錯誤行徑，只有做與不做之分，沒有違心不違心之別。對他的研究應當客觀公正地評說。

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上的講話》，載《陳雲文選(1956-1985年)》，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頁218。《新發現》一書指出，實際上周在文革中的破壞性要遠大於其建設性，他不但沒有向毛提出諫言，反而協助他破壞黨的制度與國家的法律，作為毛決策的最主要與最堅定的執行者，「周恩來帶給全中國的災難遠遠大於其行使的正常職能所帶給國家的正面作用」（頁1112）。「毛公不息，文革不止」，如果沒有周的鼎力相助，毛是不可能折騰那麼長時間的。周的行為，「不管是有意還是無意，客觀上都起到了這樣的作用：延長了毛澤東的政治壽命，也延長了中國人民的苦難時間」（頁1108）。

1958年後，周恩來從未質疑過毛的對錯，全心全意地推行他的錯誤路線。周對於毛的過份忍讓與馴服也受到非議，如劉曉波認為：

無論毛周的衝突因何而起，也無論毛如何對周施以淫威，周都唯唯諾諾。每一次衝突的平息，皆是以周的認錯為前提，而且周的每次自我作賤，皆要先追溯自己的歷史錯誤，然後上網到路線鬥爭的高度，最後是感謝毛的有益教誨和再次挽救。（劉曉波：〈周恩來的官場生存術（中）——讀《晚年周恩來》之三〉，大紀元網站，[www.epochtimes.com/gb/3/10/28/n401345.htm](http://www.epochtimes.com/gb/3/10/28/n401345.htm)。）

周是中共黨內唯一真正做到對毛馴服的人，作者認為，周之所以會如此行事，是由於對自己的錯誤定位造成的，「周應該首先是共和國

8億人民的總理，其次才是毛的部下和助手」（頁1108）。但是周卻本末倒置地將主要精力用於為毛出謀劃策，而不是將心思花在國計民生上。

當然，不可否認的是，周恩來在文革時期確實也抓經濟建設、苦撐危局。王若水認為文革中的真正悲劇人物是周恩來，「他既要忠於毛澤東，嚴格遵守所謂黨性原則和黨的紀律，又真心實意地想為民族為人民做一番事業，實現國家的現代化。這兩方面是矛盾的，周卻想兼顧」（王若水：《新發現的毛澤東：僕人眼中的偉人》，下冊，第5版〔香港：明報出版社，2004〕，頁754）。而丁凱文也認為文革中周之助紂為虐更甚於林彪，但是對其二者的評價卻是天壤之別，部分原因在於「周恩來確有關心民間疾苦的一面，在『緊跟』毛澤東『抓革命』的同時，還不忘『促生產』這個事涉國計民生之要事……而這點恰恰是林彪較為缺乏的」（丁凱文：〈前言〉，載丁凱文主編：《百年林彪》，第2版〔紐約：明鏡出版社，2008〕，頁15）。然而無論周怎麼努力，他都不能得到毛的完全信任，毛對周一直是「用而不信」，數易接班人也沒有將他考慮在內，還有意讓江青利用「伍豪事件」大做文章地整他。

筆者認為無論周恩來再如何「違心」，再怎麼「顧全大局」，也不能成為他參與迫害別人的理由，更無法洗清他的罪過。晚年時期的周主要是想毛之所想、忍毛之辱、顧毛之大局，而不是相忍為國為民。當然周的私德確實有許多值得稱道的地方，如他清廉樸素、嚴於律

己、無緋聞等，但誠如作者認為，周身為國家總理，對其歷史定位更應該從政績與政治遺產方面來考察。在毛統治下的極權主義中國，國家處於極度不正常的狀態，如果不顧現實地非要周如何如何，實在是強人所難。但我們起碼應當釐清周的那些錯誤行徑，只有做與不做之分，沒有違心不違心之別。周既不是神也不是鬼，對他的研究要盡可能地摒除功利心態，不要人為地拔高或貶低，而應當「就事論事」、客觀公正地評說。

當前中國大陸學界對於周恩來的研究仍然是停留在歌功頌德的階段，但凡涉及到較為「敏感」的地方

時，或有意迴避或故意曲筆。《新發現》主要是挖掘周在1958年後被人刻意掩蓋的歷史活動，作者力圖糾正人們對周的傳統的「高大全」的認識，加深對其全面的了解，而且自始至終也沒有否認周在其他歷史時期的功績。當然本書也存在着諸多史料使用不當之處，對於一些重大的問題並沒有深入地展開討論，如對於周與知識份子的關係、周的外交和經濟政策等都缺少分析，在一些結論的下達上也存在着推測有餘而實證不足的問題。當然，關於周的一些問題的解決還有待於新的史料的發掘與解讀，我們也期待着有關周恩來研究的新成果問世。

《新發現》一書也存在着諸多史料使用不當之處，對於一些重大的問題並沒有深入地展開討論，如對於周恩來的外交和經濟政策等都缺少分析，在一些結論的下達上也存在着推測有餘而實證不足的問題。

## 立場與方法

### ● 黃秋韻



葛兆光：《宅茲中國：重建有關「中國」的歷史論述》（北京：中華書局，2011）。

2004年，葛兆光發表了〈宋代「中國」意識的凸顯——關於近世民族主義思想的一個遠源〉（《文史哲》，2004年第1期，頁5-12）一文；就是在這一年，他的清華大學同事汪暉出版了《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北京：三聯書店，2004）一書。汪書曾引起不俗的反響，如今葛氏的《宅茲中國：重建有關「中國」的歷史